

## 总序\*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 这是任继愈先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联合组织出版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所写的总序。

\*\* 第一次在汉朝 公元前 1 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 7 ~ 8 世纪；第三次在明朝 公元 14 ~ 15 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 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20 世纪初到现在。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局面,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受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程度,却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象。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承担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

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 中文版张序

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有中学西传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中国学者钻研西方哲学，将西方哲学思想介绍给国人；另一方面也有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典哲学很感兴趣，写出了论述中国哲学的著作。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景况，是值得重视的。

英国学者葛瑞汉（A. C. Graham）对于宋代理学家二程的哲学很有研究，撰写了《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对于二程哲学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专著。

北宋时代是儒学复兴的时代。唐代实行三教并尊的政策，儒门比较淡薄。到北宋而理学兴起，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他们曾经“出入老释而返于六经”大力阐扬孔孟的学说，恢复了儒家学说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在理论思维上达到了高于汉唐儒学的水平。

葛瑞汉对于中国哲学的特点有比较深切的理解，他在本书自序中说：“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孤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这个观察是正确的。他又认为：“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伟大的时期，一个是东周战国时期，另一个是宋代。”他高度评价了宋代

理学，这也是正确的。

程德祥同志研究二程学，历有年所，近将葛瑞汉的《中国的两位哲学家》译成中文，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译文中保留了原书中二程语录的英译文句，藉以显示原作者对于二程语录的了解，这是具有深意的，我表示赞同。我希望这本书对于比较哲学，特别是中西哲学的比较能起到推动的作用。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一九九六年四月

## 中文版任序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 A. C. Graham 所著《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1958 年在英国出版，1978 年重印。1992 年美国再版。他的这部名著治学严谨，言必有据，数十年间在西方研究宋代理学领域内曾遥遥领先，至今还没有超过它的。葛氏这部研究二程哲学思想的书是西方公认的研究宋代理学的基本参考文献。

中国文化是世界古老文化之一。中国的《四书》《五经》早已被西方早期来华传教的教士与中国读书人合作译成相应的外文。欧洲人了解中国古老文化，多半借助于这些译文的介绍。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一直活着的文化，不同于古代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文化曾有过断层的现象。了解中国文化，光了解孔子、老子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同样称为孔子、老子的学说，在 2000 多年的传播和演变中不断发展变化，已经与原始孔子、老子的学说有了很大的不同。中间经历多次的变化，重大的变革有两次。第一次大变革在汉朝（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第二次在宋朝（公元十至十一世纪）。第二次大变革之所以巨大，是因为这时的儒家学说已融入了佛教与道教的某些思想观点，经过吸收、消化，形成了儒家思想的新体系。这个新体系与原始儒家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说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像二程的

思想，虽然自称直绍孔孟，但比孔孟的原始思想丰富得多，有些思想是孔孟没有讲过的，有些是改造了佛教、道教的心性修养方法，纳入了自己的体系。宋儒二程是这个新体系的最早建造者。他们提出了以《四书》作为学生的主要教材 实际上是取代儒家以《五经》为主要教材的新变革措施。这一改革到了南宋，经过朱熹的补充和完善，形成儒教 欧美学者称之为“新儒家”表明经过改革的儒家已不同于先秦儒家，也不同于汉代儒家，它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十六世纪以后，中西交通有了新的的发展。西方社会已开始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西方更迫切希望了解东方的中国。这时中国的主导思想已不再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宋代程朱以后的新儒家。而对新儒家的研究，不同于先秦儒家。西方殖民者所认识的中国，正是他们接触到的受新儒家影响了的的中国。

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思想研究的深入，他们把目光从原始的孔孟转到了宋儒，二程兄弟恰恰是宋儒新体系的奠基者。西方汉学家中，葛瑞汉的成绩较为突出。他的这部研究北宋二程的书自 1958 年出版以来，在欧美汉学家中迄今仍占有领先的地位，受到同行的重视。该书对二程哲学的重要范畴 如理、气、性、命、心、物等都有较详细的剖析，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该书的某些论点对中国学者也有参考价值。程氏兄弟既属于中华民族，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也属于世界人民。研究他们的思想、著作，是中国学术界的责任，也是世界学术界的责任。葛瑞汉的著作开了一个好头，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外国学者继续下去。

译者程德祥同志对二程全部著作钻研多年，以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继承程门传统为己任，把葛氏著作译为中文。译文忠实，译笔朴实，保持了二程学派的严肃学风。译文中凡涉及程氏原著以及其它中文原著的地方，译者全部查到原著，还原成原文，而没有采取简便翻译的办法。这一工作虽然费时费力，却对广大中国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从中也可以看出程德祥同志对译文认真负责的精神。这部书

出版后，也将对中国学术界研究二程哲学思想起着积极的作用。译者拿来译稿，征求我的意见，希望为此书中文版写一篇序。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请求，愿向社会介绍，希望中文版早日与读者见面。

任继愈序于北京图书馆\*

一九九六年五月

\* 译者注：北京图书馆(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的中文名称现已改为中国国家图书馆。

## 中文版罗序

葛瑞汉 (Angus C. Graham) 早逝于 1991 年。当时，他很可能是说英语的国家中研究近代中国思想的最著名、最受尊敬的学者。

他的如此盛名不仅是基于其著作的数量和质量，而且还基于其著作涉及范围之广：他的译著跨越《庄子》、后期墨家经典，直到晚唐诗，他的论文涉及语法、逻辑以及神秘经历。他的《道教辩士——古代中国的哲学辩论》( *Disputers of the Tao* ) 已成为关于中国古典思想的权威英语著作。他是个天生的哲学家和诗人，两个领域都遍结累累硕果。

葛瑞汉对亚洲的兴趣经久不衰。1940 年在牛津大学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后，他学习日语，并在抗日战争中为英国空军做翻译工作。战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攻读中文。《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这本书基本上是他那时写的博士论文。

此后，他被分配到东方及非洲研究院任教。在这里，他度过了毕生的教学生涯。此间，他还应邀到康耐尔大学、密歇根大学、新加坡大学等地讲学。

本书于 1958 年在英国首次出版，1992 年在美国再版，足以证明其永久价值。作为一个年少于他的老同事和好朋友，我可以自信地

说，这本书，连同他的其它著作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他会于九泉之下感到欣慰的。特别是，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是由他所研究的中国这两位哲学家的直系后裔承担，他会更加高兴。

希望进一步了解葛瑞汉著作的读者，应当查阅本序作者编辑的《中文经句与哲学背景》(*Chinese Texts and Philosophical Contexts*)。这是一本论文集，由葛瑞汉的同事和朋友们撰写，专门评论他的学识。编者在书的后半部分给这些论文作了大量释注。书中还附列了葛瑞汉全部著作和论文的目录\*。

本书初版以来曾在说英语的国家中激起广泛的兴趣。我希望——相信葛瑞汉也这样希望——这本书的中文版会在中国的程朱新儒学界激起同样的兴趣。

(美) 罗思文 (Henry Rosemont, Jr.)

马里兰圣马里学院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日

## 美国版序

这部书是葛瑞汉 (A. C. Graham) 第一部著作的新版本。

《中国的两位哲学家》( *Two Chinese Philosophers* ) 一书，是葛瑞汉在 1953 年向伦敦大学提交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最初于 1958 年在英国出版，1978 年重印。

由于作者于 1991 年 3 月逝世，这次新版没有做实质性的修订，仅于书后增附 P. J. Ivanhoe 和 Jon W. Schofer 编辑的“人名和术语索引”，并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动。即使作者生前有这个机会，他也许不愿对这部书做大的修订。诚然，保持这部书的原貌，对于那些不仅对宋代新儒学感兴趣，而且对葛瑞汉本人关于中国哲学核心问题的创造性见解的演变过程也感兴趣的学者来说，非常有益。

这个演变过程本身，的确让人感兴趣。葛瑞汉 4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为自己赢得了二十世纪最知名的汉学家之一的声誉，他以博大精深的学术蜚声四海。他的著作完全立足于中国的经典哲学，从对中国哲学的开创性研究到对《庄子》《列子》的翻译以及晚唐诗的权威译作，全部堪称极致精品。

除汉学研究之外，葛瑞汉还致力于哲学本身的研究。毫无疑问，当他在人生的最后 10 年又返回到新儒学研究时，他的哲学研究经历

影响了他对新儒学问题认识上的演变。读过葛瑞汉 1982 年写的《程朱人性说的新意》\* 这篇论文的人会发现，其中反映的见解与他在《理性与自发性》中发展了的思想交相呼应。《理性与自发性》是他 30 年后重新审视二程兄弟和朱熹人性论时的富有创新的哲学研究的硕果。

可以合理推断，假若葛瑞汉不是在学术生涯的初期写这部书，而是在晚期动笔的话，他的某些阐释，尤其是对于新儒学中人性观的见解多少会有所不同。新儒学中“理”的概念在本书中用 Principle 表示，很可能会改用 Pattern。治学始终严谨、言必有据的葛瑞汉本人一生不断地前进。因此我们只能揣测，假如他那值得赞颂的学术生涯对新儒学重新进军的话，他的研究会开辟何方蹊径。

从这部书第一版到这次新版之间的几十年中，西方对新儒学的研究领域大为拓展，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部书却从未被超越，他的成果被广泛承认，他的权威地位一直为学术界所共识。

西方学者中，他的后继者没有谁的研究有那样广的视野，没有谁以如此周全的哲学眼光来评介二程兄弟的著作。据我所知，也没有谁敢于对葛瑞汉本人学术成就的权威性及其论断的中肯，提出过认真严肃的挑战。

这部书篇幅不大 涵盖很广 洞幽烛微 发人深思 至今仍然是对宋代新儒学最好、最透彻的评介著作之一。

葛瑞汉是一位条理化的大师。他把二程思想放进十一世纪中国哲学的源流中加以研究，那近似完美的绝妙论述，至今弥足珍贵。他依据二程自己的著作和语录及其弟子、后学的观点，还有后来十二世纪朱熹的阐释，来评介这两位大哲的思想。

这部书章节划分恰当，对宋代新儒学一些最基本问题的探究，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虽然葛瑞汉的思想后来有重大的发展，但他留给我们的这部开山之作，仍然如它初问世时一样新颖、适时——这是作

\* 译者注：见本书增附一。

者那洞悉无遗的睿智和严谨治学精神的不可磨灭的明证。东风西渐，真经薪传，他所研究的这两位中国大哲，若地下有知，也会颌首赞赏。

我深信，攻读中国哲学的天下学子，不论身居何处，都会像我一样，深深感谢开庭书局 (Open Court) 和葛瑞汉学术方面的遗嘱执行人及挚友罗思文 (Henry Rosemont, Jr.)，感谢他们发起印行葛瑞汉著作新版本系列，而且极为明智地以这部书为开头——让世人永远铭记：二程是正宗新儒学的源头。

(美) 艾琳·布鲁姆 (Irene Bloom)

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所

一九九二年一月于纽约

## 英国版序

公元前 500 至前 200 年间的中国思想家，在欧洲最负盛名的，都是些伦理道德家、神秘主义者和政论家，算不上哲学家。

对于宋代（公元 960 至 1279 年）的新儒家，欧洲学者极少给予关注。尤其是，还没有人用西方语言，对二程兄弟的著作发表过一篇完整的报道和阐述。而程明道、程伊川这两位新儒学大师，确确实实应该被视为宋代哲学家中最富有创造性者。程颢（公元 1032—1085 年）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公元 1033—1107 年）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

一个欧洲人如果面对中国思想，希望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哲学传统，希望发现他当作思维必备而接受的某些基本概念，只不过是自身文明的先定观念而已，那么他很可能从宋代新儒家那里比从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获得更多的启迪。

尽管新儒家们不从事欧洲哲学家那种必不可少的严格的逻辑论证，但是，新儒家们确实使用了与我们完全迥异的概念，构筑起他们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他们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常常出人意外，而又发人深思。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技文明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第二卷中提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朝着一种“机体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的方向前进，而新儒家们正是使得这种哲学趋于尽善尽美。

总的来说，我同意这种概括，而且本书就有许多例子，证明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孤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认为万物是变化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并非向前发展），而不是静止的；看重物之用，而不是物之质；关心相互感应，而不是因果关系。

李约瑟的看法并不像某些人所怀疑的那样，仅仅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哲学对中国的一个简单投影。机体哲学的思维方法，在二十世纪的科学领域也非常突出，而且有时在中国和欧洲导致惊人相似的结果——例如，“心”作为一个整体以各种方式回应刺激的概念在中国被认为当然如此，已有两千多年，但是这种思想在欧洲直到格式塔心理学派(Gestalt school)冲破了把“心”视为分离的思想、情感和欲望的集合体的旧观念以后，才得以立足。

这些比较的意义何在？从心理学领域看，很难讲中国领先于欧洲。但中国人在开始时就综合的方法；而欧洲人则是在自己习惯的分析法不再能说明其所积累的资料时，才转向综合的方法。

有一种说法（正如李约瑟有时似乎意指的那样）认为：中国的科学在理论上超过了欧洲，只是在实践上落了后。我怀疑这种说法是否公平。

以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孤立的观点进行思维的习惯，本身并不是科学的。作为一种方法，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它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多，但是作为一种思维习惯，可以想像到，它可能在科学发展的某些阶段起过负面作用。

很自然，一种独立于欧洲之外的哲学传统保留了许多我们已经抛弃了的东西，又探索了许多我们尚未发现或刚刚发现其用途（大部分是不同的用途）的思维方法，这给那些自以为各种文明只能步其后

尘的西方人一个靠不住的印象——这种异域的哲学，是一种原始与现代相掺的不调和的大杂烩。

就本书的目的而言 强调中国与欧洲‘异’而不是‘同’会更有益些。相同之处，显而易见，而且会引诱我们去误解中国人的观念，把它们类比于我们过去或现代的理解。类比于我们过去的理解时，会毫无缘由地轻视它们，或者为之辩护；类比于我们现代的理解时，又会空洞地恭维一番。相异之处，难以捉摸，一旦发现，更有价值。这些相异之处把我们自身无意识的先定之见显露出来。

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把二程兄弟的思想奉献给一般的读者大众。因此，专业上的问题放在各章注释和本书附录中，除了汉学家以外，一般读者不必深究。

本书的范围，限于二程的哲学、两人的相互关系以及二程前后新儒家们的思想。书中并不涉及新儒学的政治背景及其受佛教影响的程度。宋代哲学家们强烈反对同时代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变法。最早的新儒学学派（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即是在张载和程明道因反对变法被解职后不久形成的。我对宋代历史所知甚少，无法判断他们保守主义的政治态度与其哲学相关的深浅程度。至于新儒学与佛教的关系，我仅提及其表面性的问题，因为我对中国的佛教同样生疏。

本书的初稿，是我 1953 年 6 月向伦敦大学提交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54 至 1955 年经在香港和日本游学一年，获得新资料后对初稿进行了修改。我衷心感谢东方及非洲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惠赐我游学的机会和经费，并资助本书的出版。

感谢已故的爱德华 E. D. Edwards 教授 他辅导我做论文的准备 工作；还有东京东洋文库的桧木教授，他介绍我使用日本一些图书馆的资料；还要感谢许多给予我有益建议的人们，其中包括西蒙（W. Simon）教授、沃利（A. D. Waley）博士、戈登·道纳（Gordon Downer）先生、刘子健（J. Y. Liu）先生和艾文（J. W. M' Ewen）先生 还要特别感谢刘殿爵（D. C. Liu）先生，感谢他关于哲学、尤其是关于中国哲学的许

多次启人神智的谈话，并感谢他对我的译文所做的许多订正。

(英)葛瑞汉(A.C.Graham)

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

一九五八年于伦敦